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边界问题考察

唐金权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界冲突开始增多。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自卫反击战、举行边界谈判等多种措施,维护了边境的稳定局势。

关键词 20 世纪 60 年代 中苏边界问题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6-04-17

Investigation on Sino-Soviet Border Issues in the 1960s

Tang Jinqua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Judicial Police,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deteriorated in the 1960s,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 happened more and more. When handling Sino-Soviet border issues, China has taken a variety of measures, such as preventing border flight, conducting preparations for military struggle and self-defense war, holding border talks, 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the border.

Keyword the 1960s; Sino-Soviet border issues

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但在当时中苏两国结盟、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政策的背景下,中苏边界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中苏边境处于和平状态。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苏两国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中苏边界冲突开始增多。

—

1960 年 8 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此后,苏联不断破坏中苏边界现状,包括引诱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干涉中国边民的正常生活和通行、甚至殴打、绑架中国边民,干扰中国军队正常的边防巡逻等等,中苏边界进入了多事之秋。

1962 年 4 月 8 日,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引发了新疆伊犁、塔城 20 多个县的六七万边民越境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为了防止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事件的再次发生,1962 年 4 月 23—29 日,新疆边防部门同苏联边防部门、伊犁外事分处同苏联驻伊领事馆就我边民逃苏事会晤七次^[1]。

由于苏联在新疆制造了严重的武装叛乱事件,中国

做好了军事平叛的准备。1962 年 4 月 30 日,新疆军区要求:“对当前未发生武装叛乱的地区,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从政治上争取群众,协助当地部门宣传,尽力劝阻群众不要外逃,保护好领导机关、国家仓库不受损失,维持社会秩序,对一旦出现武装叛乱的地区,应毫不犹豫、果断地、坚决用军事进剿平息、保卫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安全。”^[2]中国还加强了中苏边境的军事措施。1962 年 6 月,“新疆地区:中苏边境、生产建设兵团的值班部队已派出 310 人,布置在霍城至吉木乃一线的边境前沿,执行封锁边境的任务……为了从长远着眼,加强边防建设,新疆武警总队经与军区商量,并请示自治区党委同意,拟在中苏、中蒙边境第一线共设 57 个站(其中原有的 8 个站,中蒙边境新设 16 个站,中苏边境新设 33 个站),另在第二线设 10 个总站(中蒙边境 3 个,中苏边境 7 个),分段领导各边境站,边防力量增至 2200 人(原定增至 2000 人,后自治区党委又确定再增 200 人)。”^[3]

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增大,中国开始注意防止苏联的侵略。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泽

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指出,要密切注意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新疆边疆的反修斗争。要警惕苏联的军事入侵^{[4]175}。

同一时期,中国与苏联相邻的东部边境的安全也受到苏联威胁。1962年6月,“黑龙江计划在原有的24个边境站(473人)之外,再设30个边境站,并将3个专区支队的边防科改为3个总站,另设1个分总站,边防力量增至1700人。吉林计划在250公里的中苏边境设3个边境站、1个总站共140人。”^[3]1962年9月20日,黑龙江省委决定加强边防建设和边境管理:“增加武装力量2000名,增建边境工作站15至20个,使武装总数达到3500名至4000名,边境工作站达到70个左右,实现全面控制,重点封锁的要求。同时把边防的交通、通讯、防御设施逐步地建设和健全起来。……在中苏边境我方20华里内划为边防区,对在边防区内居住的居民实行居民证制度,并对居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边防法规的教育,组织边防民兵协助边防机关维护边境秩序。在嫩黑公路、滨绥铁路、松花江下游及其他通往边境的要道、站口逐步建立一定数量的二线检查站,堵截越境分子。”^[5]

二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1960年8—9月,中国就已经先后两次向苏联提出建议举行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2—8月,中苏两国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中国指出,尽管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签订新的条约,而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中方对此当然不能同意。苏联对中苏边界问题的顽固态度,引发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这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6]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苏联在中苏问题上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中苏两党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中苏边界冲突也进一步升级。中国领导

人对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做了设想,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说:“西安是后方,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是第一线。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7]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苏联)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8]326}

1966年1月,苏蒙两国签订《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根据条约,蒙古军队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权力都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在此之前,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到1968年底,驻蒙古的苏联军队的部署基本完成。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苏军在蒙古部署大体完成以后,经常举行演习,多半是设想中国军队向蒙古发动进攻的演习,他们预定一周内打到北京^{[9]1-92}。这样,苏联对于中国构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苏联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1968年1月5日,苏联军队登上七里沁岛,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多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七里沁岛事件后,中国军队对苏联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1968年1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做好军事斗争的必要准备:“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人员可以开枪予以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10]391}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日报》随后发表文章评论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并给苏联冠以社会帝国主义的称号。对此,中国对苏联的担心与日俱增,中国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要集中力

量做好准备对付苏联的入侵。

1969年3月2日,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毛泽东评论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1]312-313}4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发言:“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九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10]397}珍宝岛战役,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迫使苏联采取措施结束中苏边界冲突的局面。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恢复中苏边界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冲突。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希望避免中苏军事冲突的升级,力争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时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12]125-126}

但是,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急剧增加到近100万人,其中包括50多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13]130}。苏联还继续在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1969年6月—8月,苏联先后在新疆裕民县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黑龙江省抚远县八岔岛地区、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挑起边界冲突。

在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下,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特别是新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9月25-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召开,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等“三北”地区的战备

问题^{[14]402}。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征兵百万的命令,决定1969年冬季征兵109万人,补充兵员^{[15]2736}。

为了防止苏联利用中苏边界谈判之际发动对中国的突袭,10月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号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在19日、20日要特别注意^{[14]403}。根据号令,空军、海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解放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4100余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16]353-354}。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再次开始。尽管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已经达成了某些谅解,但事后,当周恩来把这些谅解以书面形式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时,柯西金并没有确认。谈判中,中国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五点主张:(1)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被沙俄割去的中国领土;(3)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但双方可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条约,勘界立标;(5)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撤出一切争议地区并脱离接触等。苏联对中国的5点主张拒不接受。由于苏联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不承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17]122}。从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中苏双方共进行了15轮谈判,由于苏联坚持顽固的立场,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自1978年7月以后,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这次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9年,虽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苏边界冲突有所缓和,中苏两国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了。

三、结论

回顾20世纪60年代,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自卫反击战、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等措施,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局势,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准备尽快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全面讨论了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央领导人认为,中苏边界是最长的,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也要争取解决^[18]。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上,谋求平等协商、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中国领导人反复说明不是为了改变领土现状、夺回因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领土,而是为了达到合理的边界条约。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采取攻势,讲些空话,说沙皇政府割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把外蒙古割去了。……我们是不是要回这些地方呢?我们不要,只讲些空话。目的是使它紧张一下,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7]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是苏联力图迫使中国服从其战略意图,武力解决争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被迫将战略防御重点转到对付苏联入侵上。正如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294-295}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所以,中苏边界问题很难达成共识,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2004年10月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才全线确定了中俄两国边界的走向,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应对之策。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准备应对苏联发动的战争;另一方面,创造机会,准备再次进行中苏边界谈判。对于苏联对中国边境的挑衅,中国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政策:“若苏军越境挑衅,应明确指出他们是破坏中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和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令其立即退出,但不要开枪。若其不听甚至动武,我也暂不还击,但应将情况立即上报,听候处理。”^[20]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号召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又加强同苏联的沟通,谨慎地处理中苏之间的问题。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形势紧张,但中国并未在中苏边境地区增加军事力量。8月15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1969年8月14日期间,中国军队的战斗人员、部署和行动特点与苏联及蒙古毗连的地区没有本质上的变化。”^{[21]401}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崔庸健时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22]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宣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中苏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为边界问题而打仗”。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再次开始,尽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迫使中国领导人认真考虑改善中国安全环境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必须使中国摆脱同时与美苏处于敌对的不利局面,“两害相较取其轻”,他最终做出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抉择,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当时的安全环境。

参考文献

- [1] 新疆外事处、边防部门关于我少数民族边民逃苏事的交涉[A]. 1962.5.4-1962.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18-01126-09.
 - [2] 新疆军区关于作好平叛作战军事准备的通知[A]. 1962.4.30-1962.4.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18-01100-12.
 - [3] 武警司令部关于加强中苏、中蒙边境控制的措施问题的情况报告[A]. 1962.6.28-1962.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18-01061-12.
 - [4] 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5]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中苏边境地区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A]. 1962.9.20-1962.9.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18-01060-03.
 - [6] 毛泽东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外交通报第95、126期)[A]. 1964.7.28-1964.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05-01897-03.
 - [7]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Z]. 1964.10.7.
 - [8] 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9]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 [10] 萧心力.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1] 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林克.历史的真实[M].香港: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 [1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3] 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 [14] 何明.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5]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66-1977[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16] 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3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 [17] 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第3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 [18] 朱昭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J].东南亚之窗,2012(2).
 -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总参、武警司令部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A]. 1962.5.14-1962.5.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18-01061-04.
 - [21]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22]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谈话记录[Z]. 1969.10.1.
- ★注 此文系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的相关内容修改而成。
- ★作者简介 唐金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